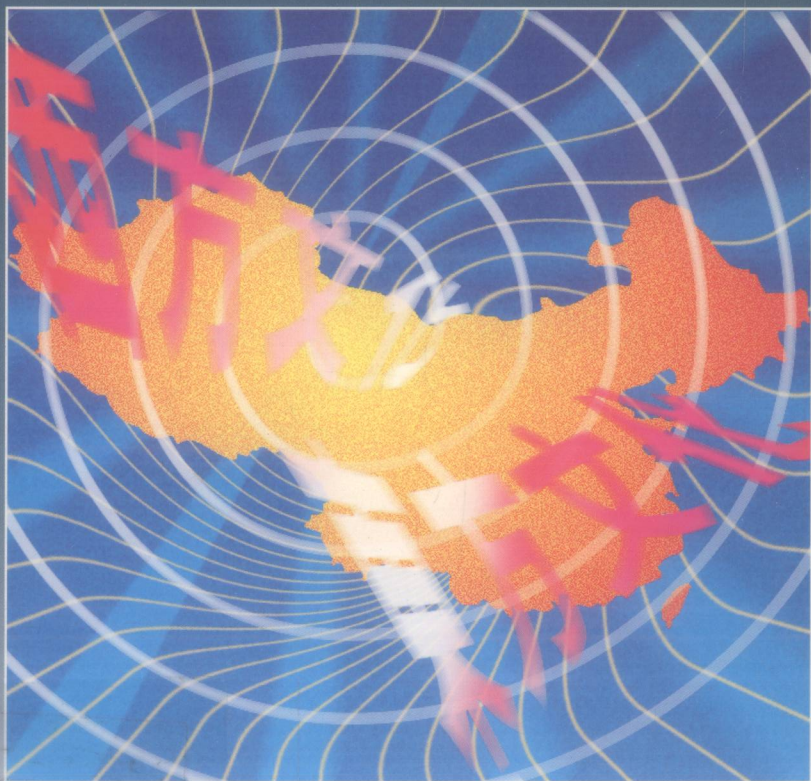


獨共南山守中國

胡國亨



G104
20072

港台書室

佛利民講座基金論文集

獨共南山守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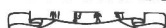
——戳破西方文化優越的神話——

· 胡國亨著 ·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



00885913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敬贈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 香港中文大學 1995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711-8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叢書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南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香葉道怡達工業大廈

HKCER Paperbacks

**The West in Distress—Resurrecting
Confucius's Teachings for a New Cultural
Vision and Synthesis (in Chinese)**

By Henry K. H. Woo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 962-201-711-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 Tin, N. 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佛利民講座基金論文集

獨共南山守中國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為一研究與教育性信託組織，於一九八七年依契據法成立。本中心贊助與公眾政策問題有關的研究及出版研究報告，藉此加強市民對經濟事務的了解，並為決策者提供政策上之選擇。

中心之工作由下列人士組成之顧問委員會協助：

Prof. Geoffrey Brenn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Prof. Yale Broz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Prof. Steven N. S. Cheu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Prof. Isaac Ehrlich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Prof. Herbert Grubel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Lord Harris of High Cross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U.K.
Dr. Y. C. Jao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Prof. David Laidler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Prof. T. B. L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Prof. Patrick Minford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K.
Prof. Sir Alan Peacock	David Hume Institute, U.K.
Dr. Alvin Rabushka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Prof. James Riedel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Prof. Pascal Salin	Université de Paris-Dauphine, France
Prof. Julian Sim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Prof. Peter Swan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Prof. Gordon Tullock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Prof. Arthur Waldron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Prof. Sir Alan Walter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U.S.A.
Prof. Edwin G. West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已註冊為一不牟利慈善機構，由其董事會管理，並賴出版收入、個別人士、企業、基金會等捐贈以維持。

研究中心主任：王于漸

香港經濟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
香港・薄扶林道

電話號碼：852-25478313 圖文傳真號碼：852-25486319

佛利民講座基金

佛利民講座基金是因米爾頓・佛利民博士(Dr. Milton Friedman)在1988年9月24日於香港公開講座所得的款項匯集而成立，由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及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共同管理。該基金旨在支持研究，以促進了解市場對經濟生活的作用；個別學者及機構均可獲得資助。

序 言

「斬鰲翼螭皇，煉石補天維」

（李白）

一九九四年七月，我在台北參加一個研討會，與一些台灣朋友促膝詳談，其中的呂惠恕兄認為，我去年出版的兩本書《到富強之路》（1993）及*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Mind*（1993）（《尚智社會與中國前途》）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看法雖然有些見地，但卻未能直接解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而這個問題，與中國文化研究基金會未來的發展，是有莫大關連的。

惠恕兄的看法是，目前的中國人普遍對中國文化已失卻信心，口頭上說認同的，心底裏可能充滿了疑惑。就算願意支持中國文化活動的少數人，恐怕也只是出於懷舊之情或鄉土之心。現代化的觀念已成為當代中國的主流，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亦已普遍被中國人接受或嚮往的生活方式。

惠恕兄覺得，要推動中國文化的復興，首先要恢復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信心。要中國人對中國文化有信心，先要解答一個問題，即是中國文化到底有什麼優點值得我們去擁護，值得學者和思想家窮一生之精力去研究，去重整和去宣揚。我對惠恕兄的回應是肯定的。這篇論文，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寫的。

中國文化到底有什麼優點？這個問題不可能不牽涉與

西方文化的比較，所以嚴格來說，中國文化優劣的問題，自然變成文化體系比較的問題，再進一步更牽涉到整個現代化的問題。例如中國這種文化背景的社會是否可以走上真正現代化之路？西式的現代化是否值得無條件追尋？追尋西式現代化的代價是什麼？如果有，這個代價是否太大？

要解答以上的問題，顯然需要一套理論架構去剖析西方文化的優劣所在。有關西方文化的優劣，一直以來，學者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參閱本文第一部分）。我個人的看法是，這些觀點往往以偏概全，未能全面探討西方文化的特性。爲了更有效地透視西方文化的本質，我大膽提出六個較新的角度去評估西方文化及其發展形勢與方向。

從這些角度看來，我對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現代化有很大的保留。西方文化發展的兩條主線，即個人主義及智性，兩者之間無疑是有相輔相承的一面，在過往數百年間，兩者的確經歷過良性循環的階段。不過，這個良性循環不可能無止境般延續下去。反之，西方的發展正蠶食其智性的基礎，而西方的科技亦正在不斷削弱其個人主義的根基，這些發展正顯示出一個惡性循環經已出現。再考慮到其他的因素，西方文化的前景是令人憂慮的。嚴重一點說，西方文化現正走向一條失控及衰敗的道路。雖然現在正如日中天，但目前的光輝，恐怕只是迴光反照而已。

西方文化發展的歷史，可說令人歎爲觀止。西方的成長過程是一首悲壯、可歌可泣的史詩；一首由孩提長大到成人所經歷的史詩。由人與神的千絲萬縷的關係，發展到從神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物質主義的衝擊引致靈與慾的掙扎；令人如痴如醉的現代科學揭開宇宙及生命之謎；殖民者那種冒險精神；工業革命的洗禮；階級鬥爭的慘烈——一幕幕希臘式的悲劇，不斷在西方的文化舞台上演

出，其偉大與蒼涼之處，實在動人心弦。西方的開放社會與心靈充滿了鮮血和淚水、希望和恐懼，也充滿了生命及死亡。

然後如同旭日般，西方的科技照亮了整個世界；西方的民主打碎了極權者的甜夢；西方的人權自由使很多地區的人發現或重拾自己的尊嚴；西方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帶來新的希望；西方的智性滋潤及啟發了不少的心靈；西方智性後面的道德觀帶來令人神往的清新。西方文化的發展雖然粉碎了個人英雄的迷夢，但西方文化本身卻是一個令人痴戀的「英雄文化」。

回顧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儒家社會，比起西方顯得那麼僵化與腐敗。胡適等批評的「國粹」，例如「八股，小腳，太監，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牢，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是難以解釋與捍衛的規範與行爲。再與西方相比，更顯得中國物質程度的低落，中國人普遍的愚昧與無知。難怪當時有識之士，血氣沸騰的知識分子，無不對中國文化口誅筆伐，極盡鞭撻之能事。

縱使中國文化沒有出現清末那種的腐敗與僵化，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寂態的，既無目下的光彩，亦無燦爛的前景。這種難忍的寂默，與西方物質的輝煌、上帝的力量，實在無足可觀。中國儒家那種主張內心默默修德的耕耘，滿足於淡如水的「君子文化」，又哪裏有西方「英雄文化」那般壯烈和吸引。近數十年「亞洲四小龍」的崛興，使舉世對儒家社會的經濟表現刮目相看。對表面上並不支持物質主義的儒家的倫理道德竟然會是經濟發展的因素感到十分驚訝，但這種情況，相信只能維持一段短時間。長遠而言，儒家因素將被現代化的個體價值觀所取代，日本目前發展的情況，正足以說明這點。

不過我們或許想不到，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一度被我們視為西方文化典範的美國，正出現無數令人沮喪的社會問題，在科技與人權的幕後，一個滿目瘡痍的社會正展示在我們的眼前——教育的低落，暴力與吸毒的泛濫，精神病與疏離感的普遍，利益集團的傾軋，貧富的懸殊，地球資源的濫用及環境的破壞，這一切一切，令人懷疑西方文化的優越性。

如果歷史中儒家社會僵化腐敗，而當代的西方社會滿目瘡痍，那麼正邁向現代化的中國前景又如何？以目前的形勢看來，現代化可能帶來物質的豐盛，使少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長遠而言，恐怕會引領中國走上另一種艱難的局面。自我主義的肆虐、貪婪、自私與人的素質的低落、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與極度貧富懸殊、名牌消費、失落與暴力等等，加上可能出現一般發展中的國家無法逃避的高通脹、貨幣貶值、資金流失等情況。沒有法治傳統而硬生生現代化，最終可能走上「印度化」或「拉丁美洲化」之路。

如果西方衰敗，仿效西方的現代化未必會有前途，那麼未來的中國應該何去何從？在這裏我提出一個大膽的看法，我個人認為，孔子思想（不是儒家學說）的復興，可能會為中國未來文化建設提供一個最健康、最紮實及最平衡的基礎。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重新探討孔子思想的現代意義，分析西方文化社會價值的支柱——民主、人權、平等、自由、法治、理性等概念。我認為西方文化的基礎概念，其實是充滿矛盾及不可能完美地實現的。反之，孔子學說卻巧妙地避過了這些概念之間的矛盾，可以豐富這些概念的深層基礎。孔子當然並沒有提出邏輯的論據，但孔子的洞察力卻是跨越時代的。相對於西方文化的基礎理論，孔子的看法更深入，更完整。尤其重要的是，孔子的

看法，與西方一些最重要的概念，只有互補性而沒有衝突的。

我強調孔子思想，而不是儒家學說，因為我認為孔子與儒家之間，特別是與後期的儒家之間，有很大的差距，一定要劃清界線。我的看法是：儒家的發展，在不同程度上使孔子學說變了質，不論是與法家配合，或是與道家結合，或是與佛家融會，都產生了一種異化，都是偏離孔子中庸之道。我這種說法，不是否定其他學說或部分儒家學說的貢獻，但我認為重新強調孔子學說，為孔子學說重新定位，作為透視其他文化的本質，是重要而有積極意義的。

在上述的基礎上，我提出一個嶄新的文化批判架構，將西方文化及以孔子為主的中國文化作一比較。在這個架構下，我將我批判西方文化的標準搬過來，看看中國文化是否像我們主觀印象中看來如此的不濟，仔細評估中國文化的得失，探索中國文化與生物演進的原則是否有矛盾，再以一个較長遠的角度，檢討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演進中的發展情況。

的確，我們沒有西方悲壯的心路歷程，沒有西方由孩提成長到成人的挑戰，但五千年前，當我們的祖先濯足黃河之時，他們的心靈已不再是孩提的心靈了。他們並沒有選擇拼音文字，也沒有選擇上帝。沒有拼音文字，彷彿註定了他們的後代發展不出高智能及現代科學；沒有選擇上帝，他們只能倚靠自己內心的資源，只能在人世間找尋人生的意義，只能在單調苦澀的生活中找尋幸福。從開始，他們便既成熟但亦無知，無知地及成熟地，默默地過着平凡淡泊的生活。

一九九四年十月中旬，在這篇文章初稿接近完成的階段，我與匹斯堡大學一位美籍猶太裔的經濟學家鮑文

(Mark Perlman)交談，他暢然地說：「我對你的看法並沒有太大的驚訝，以一個猶太人的角度看來，英式美式的文化，真是淺薄得可憐。我個人認為，近百年來，不論在科學上，文學上，道德上，以英美為主流的西方只不過是裝腔作態，自以為是而已，並沒有對自己作過認真的反省！在我們猶太人心中，只有儒家學說才可以媲美和超越我們猶太文化的層次和深度。起碼在羣體觀念、價值觀方面，中國文化與猶太文化之不謀而合，實非偶然的事。」

到底我們應該選擇金光燦爛但只能維持一刹那的西方文明？抑或選擇淡然無味甚至曾出現僵化腐敗，但卻有持久力的中國文明？又是否兩者之間只能取其一，而不能互相攝取對方的優點而放棄其缺點？如果我只能在二者間作一選擇，那麼從人類及地球存亡的角度而言，從個人平衡發展的角度而言，我寧可捨棄西方的燦爛而保留中國的平淡。

但是我不能忽略或抹煞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實，實際上可供我們選擇的空間是狹隘的，人類選擇了個體化而摒棄羣體，已經走上了不歸之路。吸取了西方的智性，經過啟蒙與洗禮，我們已經不能再視之如無物。收攝了印度佛學的靈性，我們再也不可能說沒有受其感染。中國踏上現代化的路途，亦已走了不少路，再也不能回到最初的起點了。

在這種無情的現實制約下，何去何從，將是一項極為痛苦與困難的抉擇。我們既不能放棄現代化，但亦明知追尋純西式的現代化要付出極高的代價（甚至最後自我毀滅的代價），那麼我們該如何取捨，如何自處？我們能否將中國文化最優秀的特點，匯合西方文化最優良的部分，重新建立一個以中學為體的中式現代化？我們是否需要考慮建立一個短期、中期、長期的混合文化策略，一方面應付

目前的困難，一方面重新建立長遠生存的基礎？到富強之路的代價，如何可以減至最低？

上面這些課題，都是既迫切且龐大的，其中包括的所能及可行的方案，更是複雜異常，加上現實的制約，都是極富挑戰性的研究。不過，解決問題的方案，本書卻付之闕如。一位看過我初稿的朋友，大力慫恿我擴大本書的篇幅，以便提出一些較具體和積極的建議和方案，他說：

「對中國文化未來的解決方案，在這本書中已經呼之欲出，為什麼你不進一步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以便其他人可以研究批評？」我覺得，當代中國首要處理的問題，是方向性及基礎性的問題，貿貿然提出特定的解決方案，以為這些基礎性的討論已告一段落，是鹵莽而危險的。

今天，我們最迫切需要思考和探索的，不是具體的建議，而是方向性的問題，是西方文化是否真正衰敗失控，孔子學說是否不合時宜，中國文化是否有長遠的活力與原動力。我希望其他人士可以在這些大問題上提出新的觀點，新的看法，使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不再歧路亡羊，不再不知所措，以致陷入進退兩難，或進退失據的局面。況且解決這些問題，無法不牽涉非常艱巨的學術工程，必須羣策羣力，推行一個長期及多元的文化探索運動，這實非我個人可以擔當。有關這方面的工作，亦明顯是未來中國文化研究基金會的首要任務，所以我不在此提出個人的意見了。

不過，我的初步的看法是，如果西方社會要徹底自救，那麼最佳的選擇可能是與中國文化(孔子學說而不是與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文化)全面結合。在個體化與羣體化及在外在化與內在化之間較為不偏不倚的中國文化，相信會給予西方文化一個較清醒而理性的比較。一個可能性是，以孔子的學說為基礎，一方面吸收西方的個體

性、智性及外在化三者中部分的優點；另一方面收攝佛家的靈性，創造出一個「大孔子學說」(Greater Confucian Thought)。似乎這個融會綜合的學說，會有較大的空間，可提供一些真正實際可行的辦法，引領人類走出目前陷入的險地。

香港經濟學社(IES)、中國基金會及其他的海外朋友，對我這篇文章的撰寫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和協助。首要致謝的是劉潤和，其次是洪樹堅、呂惠恕、關少棠及梁展文。此外，下列各位朋友亦給了我不少的意見，使我可以避免很多幼稚和不成熟的看法。他們是：劉國華、黃志光、林記和、石齊平、周慶生、丘世文、簡國裕和楊焯聰。特別要感謝的是香港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于漸，他為我安排這本書的出版事宜。還有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黃瑞良及總編輯馮溢江。由最初開始不倦地負起校對和編輯工作的是香港經濟學社的行政秘書陳妙姘，我在此對她表示萬二分的謝意。最後的是我的秘書饒林紅，她由最初的第一稿到最後的第六稿，一直默默地負起本書的打字工作，我在此致以衷心的感激。至於本書中觀念上的偏差或論據上的謬誤，當然是由我個人負責。

本書的書名《獨共南山守中國》，取自李賀詩〈官街鼓〉。〈官街鼓〉最後四句為

「從君翠髮蘆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回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絕」

雖屬武斷，我這個取材實有兩個含義，一是借用李賀描寫的「幾回天上葬神仙」那種超越其他中國詩人的時間觀去表達一個極為長遠的分析架構及角度，這種源遠流長的時間觀或可比喻為一種「演進」的時間觀，亦即是說，我認為西方文化的崛興與壯大，只不過是近三幾百年間的

事，在這短暫的時間中，西方文化的確顯得光芒萬丈，但以一個較為長遠的演進角度而言，這種富衝刺力的光輝恐怕未必能持久。反之中國靜止及平淡的文化卻可能在時間的長河默默地延續。

我的另一暗喻，是指目下的西方文化的基礎價值觀，如自由、民主、人權等，在華人社會已經根深蒂固，已經變成不容爭議，再沒有討論餘地的基礎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堅守中國文化中的價值觀自然顯得孤獨與無依，「獨共南山守中國」或可捕捉少許這種蒼涼及無夸的感覺。

胡國亨

一九九五年五月於香港

作者簡介

胡國亨為香港經濟學社及中國文化研究基金會主席、國際經濟方法學會行政總裁、《經濟方法學》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

胡國亨的著作包括：*A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教育的重建》1977）、*The Unseen Dimensions of Wealth—Towards a Generalized Economic Theory*（《隱蔽的富源》1984）、*What's Wrong with Formalization in Economics?—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經濟學量化的謬誤》1986）、*Effective Reform for China—An Agenda*（《返樸歸原的中國經濟改革》1991）、*Cognition, Value & Price—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認知、價值與價格——一個廣義的價值論》1992）、*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Mind: Intellectuality and the Future of China*（《尚智社會與中國前途》1993）、《到富強之路》（*Back to Power and Prosperity: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1993）。

摘要

二十世紀末是中國充滿希望、痛苦及危機的時刻，因為西化及其衍生的現代化正替中國帶來源源不盡的動力。甜蜜的憧憬，但同時亦帶來了沉重的衝擊，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及中國茫茫大地的風貌。在這個關鍵的時刻，現代化的成功機會有多大？其代價有多高？中國的現代化是否勢在必行，義無反顧？我們是否盲目歌頌現代化的利益而對其禍害視而不見？抑或我們明知前景堪虞，但卻苟且偷安地迴避這些問題？

禍福互倚，西方文化目前的光芒雖然色彩繽紛，可是卻危機四伏。自從馬爾薩斯(Malthus)發表其《人口論》以來，西方有識之士正不斷反思西方發展模式的前景與命運。環保論者認為，以地球有限的資源及脆弱的環境，到了今日，已是黃台之瓜，不堪再摘，但科技論及市場論者卻認為，未來的科技，配合自由市場的運作，不只可以解決地球的環境問題，更可養活更多的人口。兩方面各執己見，議論紛紜，莫衷一是。

繼《到富強之路》一書之後，本書的作者集中了演進論、認知論、本體論、文化論、遊戲論等不同學科的觀點，擺脫道德方面的判斷，指出科技論及市場論者的謬誤，提出一個超越西方目前各學派的理論架構，論證西方正走向一個衰敗及失控的方向，為這個困擾西方思想界的跨世紀的「大問題」提供一個結論性的論據。

作者指出：